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 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 83751111 手机上网 m.fznews.com.cn

■编辑:黄芳宾 美编:林若菡 电话:83762578 E-mail:fzrbsx@sina.com

1941年,24岁的聂曦以少校衔来到吴石少将身边担任副官。这一任命,既是两位闽籍军人命运的交汇,也为一段秘史同行的历程埋下伏笔。

福建是近代海军的摇篮。

1935年,18岁的聂曦考入海军陆战队讲武堂。这所为强化福建海防设于长门、马尾的学堂,是南京政府海军部培养基层指挥人才的基地。学员分陆战队中下级军官及军士两类,毕业后均授尉官。讲武堂课程以两栖作战为核心,结合福建沿海地形开展滩头登陆、要塞防御等专项训练。自陆战队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聂曦历任排长、粤桂江防司令部上尉队长。

粤桂江防司令部负责守护西江、珠江等粤桂交通命脉。1938年广州沦陷后,西江成为西南国际补给线桂越公路的重要依托,部队也随改编隶属于第四战区。1939年底,昆仑关战役中,江防部队在西江、邕江等水域能封锁航道,虽未阻敌进攻,却迟滞了其补给线,为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昆仑关战役是吴石军事生涯的重要节点。昆仑关作为南宁北侧天然屏障,1939年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反攻命令,作战计划由吴石制定。他经大量情报收集与侦查,拟定缜密方案,指挥部队歼灭日军4000余人,击落击毁日机20余架,重创日军第五师团。

据黎友吴仲德回忆,吴石每日清晨骑马、练武,风雨无阻,办公室内挂满军用地图,作战计划皆亲自草拟,其敬业与爱国精神一目了然。

同为闽籍,又并肩抗战同一战场,聂曦对这位才识卓越的前辈深为折服。吴石选聂曦为副官,既有乡亲情谊,更有对其人品才干的考察。聂曦6岁丧母,14岁丧父,在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却永失依恃。聂曦心里,想必有着一个英雄的父亲之梦。他依姑母聂淑贞(嫁三坊七巷宫巷杨氏)生活,这份孤苦让他更易对正直的吴石产生信赖。彼时,两人均未料到,这一追随竟直至生命终点。1950年,他们一同牺牲于台北马场町。

皖南事变后,吴石陷入苦闷,曾与何遂共同创作《长江万里图》(由何遂绘画、吴石题诗),以“共济安危托一舟”“秋风斜日更添愁”抒发忧思。聂曦的到来,为这位失意将领增添了可靠助力。

吴石(1894—1950),原名萃文,字虞薰。从他出生起,就生活

吴石与聂曦的并肩行

■陈碧



【闽都新谭】



林若菡图

在一个国家多故,战火频仍的时代。

少年时,他就仰慕为推翻帝制的黄花岗烈士们,把林觉民那句“为天下人谋永福”读到投笔从戎,参加学生北伐军——17岁的吴石加入福建北伐学生军。想必正是这个时候,他才改得此名。后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张治中等一众名将同期,年终及毕业考试均获全校第一,被誉为“军校状元”。1916年末,更是以同届800余人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日军投入三分之二兵力,意欲打通大陆交通线。吴石多次向中央请援,但因种种原因,遭遇“拒不发兵”。11月,桂柳失守,加之盟军“错炸”,造成近万军民丧生。他认清国民党腐败独裁的本质,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中饱私囊,货币崩溃、工厂倒闭、民不聊生。1946年,聂曦随吴石进入国防部史料局(1948年改史政局)任总务组中校组长。

吴石于近处见证国民党腐败,痛心之余,越想起少年时读过的林觉民“为天下谋永福”之信念。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吴石在1946年书写《自传》,对往日之自己作了回顾和分析,想必就是此时已下了某种决心——1947年,吴石与中共华东局建立联系,走上隐蔽战线。

三

聂曦追随吴石期间,不仅是工作上的助手,更在日常中耳濡目染其人格操守。吴石清贫正直,对聂曦的影响远不止军事技能传授。

吴石喜爱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常教子女临摹,称其“字字铜筋铁骨”。

聂曦受其影响,亦将此帖奉为至宝“……刑不残,兵不黩。赤子无愁声,苍海无惊浪”的帖文意境,现在也渐渐成了他的精神追求。

吴石还用福州话教子女读《孟

子》,讲解“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聂曦入伍前文化不高,父亲去世后便辍学从军,吴石的讲解让他对“仁义为本”有了深刻理解。

1949年,福州解放在即,国民党急令时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将绝密档案运往台湾。这时,聂曦临危受命,将298箱绝密档案从于山戚公祠全部转移到仓山麦园路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福州解放后,这批关乎东南战局的档案安全移交,为后续工作保留了关键资料。

1949年8月,吴石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抵台,聂曦随行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彼时,白色恐怖肆虐,陈布雷之女陈琳、婿袁永熙均被抓,在舆论下才未被施以极刑。

聂曦深知吴石的秘密任务后,全力协助。作为吴石最信赖的亲信,他代其联络各方、物色工作对象、索取核心材料。

聂曦与吴石并肩前行,从同乡情谊与对爱国情怀的敬重而选择沉默并掩护,至最后走上共同革命之路,是乡情、知遇之恩与共同信念交织的结果——这份信任,足以让他直面生死。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吴石、聂曦与朱枫、陈宝仓一同赴死。临刑前,吴石留下绝笔“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聂曦亦从容站立,与他毕生追随的前辈并肩,走向生命的终点。

从1941年春的副官任命,到1950年夏的刑场并肩,十载光阴,两人的脚步从未偏离,如太阳星辰,即使暗灰,也一生照亮。

岁月流转,如今,他们的身影依旧挺立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福州三山陵园等处,讲述着并肩行的故事。

发现林义光

■陈倩叶

【风雅闽都】



1932年6月的一封信函后补记云:“此去年林君来简,不久林君以暴病谢世矣,昔哉!廿二年四月十日晨,树达记。”由此才得以知晓其卒年。林义光与杨树达往来信函共有三封,在另外两封信函中,又可知林义光曾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之后又任教于清华学校。此外,笔者发现在1921年6月北洋政府外交公报中,曾刊出一则委任公示:“部令,委任林义光为本部主事。”亦可印证其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之实。闽籍易学家黄寿祺曾于1929年进入北平的中国大学文科预科班就读,其高足张善文曾属文记叙黄寿祺求学经历,“从杨树达(字遇夫)先生治学训诂,并从范毓桂、余嘉锡、孙人和、朱师辙、林义光、唐兰等先生接受各种学问”,则知桥川时雄对林义光的介绍所言不诬。

林义光的《文源》刊印于1920年,由于刊行量少、传播范围有限,目前仅见有林义光自印本、抄本、油印本三种。遍查福建省内馆藏,其中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藏有林义光自印本三册,厦门大学藏有抄本三册,而油印本二册仅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源》是一本以钟鼎金文为主,采撷石鼓文、汉魏碑刻等文字材料对汉字的构形以及本义进行研究的学术性著作。全书一改《说文解字》用小篆作为字头的体例,以金文作字头,但“金刻不备之文,仍取足于小篆”,共收字头1551个,分十二卷。这样的体例编排十分有创新,故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曾认为《文源》是一部“比

较集中地反映了宋至清代利用金文探求字源的成果”。

除了在体例上进行创新外,《文源》还对中国传统的“六书”之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与阐发。林义光在《文源》中附有《六书通义》一文,该文不仅总结了传统“六书”理论的得失,还创造性地将象形分为全体象形、连延象形、分理象形、表象象形、部列象形五类,将指事分为表象指事、部列指事、形变指事三类,又针对形声字提出了“二重形声”的结构。

林义光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建树,可见于其1931—1932年发表于《国学丛编》的四篇研究专论:《释裁蓄》《鬼方黎国并见卜辞说》《卜辞焱懿即炎惑说》《论殷人祖妣之称》。《国学丛编》是中国大学的学术刊物,章太炎、杨树达、吴承仕等名家经常在该刊物发表见论,而林义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内容,则主要集中于甲骨文研究领域。例如在《卜辞焱懿即炎惑说》中,林义光对甲骨卜辞中的“焱懿”一词进行了考证,认为甲骨文中的“焱懿”即是“焚惑”,并根据《天官书正义》云:“焚惑主死丧,大鸿胪之象;主甲兵,大司马之义。”将“焱懿”解释为“理兵之官”,是跟随商王打仗的军事首领。特别是“懿”字,林义光在文中认为,先前王国维将该字解释作“欬”(同“藏”)字,罗振玉释作“洗”字,孙诒让释为“夏”字,均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林义光根据青铜器“虢季子白盘”中的金文字形,将该字确定为“懿”。21世纪以来,有学者再次对

该字进行考证,亦得出和林义光一样的解释。

林义光虽毕生致力于文字学研究,但其治学成就还涉

及经史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就是《诗经通解》一书。该书一改前人研究《诗经》的办法,创新性地通过征引钟鼎铭文以探求诗义,采用古文字研究的手段,对《诗经》进行考证。如,《诗经·小雅·雨无正》:“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林义光认为,“可使读为考事。师嫠敷‘在昔先王小学汝,汝敏可吏’,齐侯‘是余为大攻,暨大吏、大徒、大僕,是以可吏’,多父盘‘其事夏多父盾寿考事’,可吏与考事同,亦即此诗之可使也。可、考双声。以可为声,则可、考古音亦相通。”其根据师嫠敷、齐侯等多父盘等青铜器中的金文,对《诗经》中的用词进行考释,这样做法与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暗合,堪称“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经典事例。

林氏之学虽以金石甲骨为主,但并未拘泥于文字研究本身,他以文字研究为出发点,触类旁通,施及经史。据古文字学领域学者田胜男所言,林义光这种以金石之学治《诗经》的方法,为后来的闻一多、于省吾利用古文字材料考释《诗经》奠定了基础。《中国通史·第三卷》中,就将林义光的《诗经通释》和于省吾的《泽螺居诗经新证》列为研究《诗经》的必读书目。

“小事”见态度

■李伟明

看古装戏,常见百姓击鼓鸣冤的场景。这是古人告状的主要方式。衙门外的那只鼓,叫“登闻鼓”。击登闻鼓,有诉求可以直达高层。就如现在的领导在信访局接访,群众有问题可以当面反映。

登闻鼓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在晋武帝时期,就在朝堂外设置登闻鼓,允许百姓直接向朝廷告状。而类似做法,可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只不过未必叫这个名字而已。登闻鼓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省去中间环节,让百姓有机会与“大领导”面对面。后世有些皇帝比如朱元璋,就曾接待击打登闻鼓的百姓,以此防止“中梗阻”。当然,这种情况估计并不多,否则皇帝再勤政,恐怕也忙不过来。到了清代,对击打登闻鼓设置了一些条件,寻常百姓就不一定有机会直接到朝廷鸣冤了,登闻鼓也就渐渐形同虚设。

按理说,告状告到最高层,事情应该小不了。但凡事总有例外。《续资治通鉴》第十七卷记载,北宋淳化四年(993)十月的一天,京郊地区有百姓击打登闻鼓,反映自家的猪不见了。宋太宗知道后,下令赐给申诉者一千钱抵偿猪价。宋太宗对宰相说:“这么小的事也要听理判决,真是太可笑了。但是如果能按照这个态度来治理天下,那就可以让世上没有什么蒙受冤屈的百姓了。”

宋太宗的后半句话,换到现在来说,不就是我们常讲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吗?姑且不论那个失猪百姓的做法是否妥当,从执政者角度来说,以处理重要事情的认真态度来对待百姓的琐事(其实,很多事,在上层人士眼中是小事,在底层百姓心中却是大事),总不会有错。相反,如果认为小事不值得理会,持漠视态度,那么,哪天遇到大事,也同样会被习惯性忽略。

勿以善小而不为。把一件件小事办好,几经积累,便办成了大好事。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大事可办。我们遇到的事情,基本上都不

大。之所以有些人后来办成了大事,那是因为人家没有放弃干小事。有的人一辈子一事无所,是因为他好高骛远,一直在期待大事降临。但非常不巧,大事与他无缘。

对今天的干部来说,尤其要明白,群众遇到的小矛盾不处理,便可能演变成大问题。经常接访就知道,一些上访户的诉求,就是因为问题在萌芽状态时,相关人员没有认真对待,努力解决,导致小问题积压成了大问题,最终成了棘手的问题。接访的初始环节太重要了。

“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是挂在嘴上说说的,要用实际行动把每一件事办好。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事情本身。化

解了矛盾纠纷,就增添了发展力量。否则,一个地方如果纠纷不断,大家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这些事情上,哪有工夫发展经济?这种内耗,最不应该。表面上看,这是当事人的事,无关旁人利益。其实,真算起账来,也是人人买单,因为公共资源属于大家。

说到“小事”,《续资治通鉴》第二十四卷还记载了一件事。北宋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去世。书中专

门记录了李沆的有关事迹,其中说道,宋真宗上位之初,李沆每天将各地水旱灾害和盗贼作乱的情况报给皇帝。参知政事(副相)王旦认为这些是小事,没必要打扰皇帝。李沆说:“天子正在少年之时,应当让他知道民间疾苦。否则,他不是留心声色犬马的享乐,就是搞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那一套。”在李沆看来,地方上的各种灾情虽然不是全局性的,但与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才不是小事呢。因此,不必担心打扰领导,该报告的就要及时报告。读史书,经常可以看到类似记载。

“小事”见态度。只有重视百姓身上各种“小事”的人,心里才会真正装着群众利益。



女子本芬芳

读赵玉明散文集《在时间的河里》

■刘爱玲

赵玉明是我的鲁院同学。

打开《在时间的河里》,近70篇散文分成三辑:“走读河口”“桂花馨香”“乘着歌声的翅膀”,饱含深情的文字在这个身有不便的女子笔下,密密编织。

那年鲁院相别,几位要好的同学有一个美好约定,其中一个环节,是去福州看玉明。但对于我们这些困在身体里的残障者,行动起来何其艰难!很多时候,我暗暗猜测,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退化,福州相聚,也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然而,当我捧读玉明的散文集《在时间的河里》时,我发现,她把我们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跟随她细腻的笔触,我走进了她的福州、她的时间之河……

读玉明的散文,首先感到,她是个芬芳的女子。

她在《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中写道:“茉莉花的香像涌动的波浪,水一样覆盖了我的全身……仿佛我的呼吸都带着茉莉的香气。”她写《油菜花开遍地黄》:“春风的纤手婆娑轻抚,那些娇柔的花在摇曳晃,像是发出了少女般银铃的笑声,如音符在琴键上欢快跳跃,清脆明快。”在《北园路的春天里》,她以特有的视角,指给我看那一树我从没见过的木棉花:“如一个红色的花碗,盛满一碗春光。风铃木黄色的小喇叭花,倒映在黑色的沥青路面上……”在《种一棵狗尾草》里,她写道:“重生的狗尾草……它释放出的生命活力,如山泉淙淙,如清风拂面,我内心焦灼和迷茫,也渐渐平息。”

玉明喜欢种花,她甚至从遥远的福州给我送来一束太阳花。我家的阳台上,现在还开放着她送的花儿。但直到读了这本散文集,我才知道她喜欢花的缘由。她写的是是一朵花,一棵草,一粒米,其实写的何尝不是一个人的人生,一波三折,历尽艰辛后,依然心向阳光,蓬勃生长。

她写的是花草树木,也是一个女子的蕙质兰心;写的是慧眼,用心发现,把那些细小的美指给你,也是自己勃勃跳动的生命之歌。

其次,她是个心怀感恩的女子。

她写《寻福记》:“30年,白驹过隙,飞逝而过。我从湖北到福州,从最初的油印工,到打字员,再到内刊编辑,一步一步,每一步都站到了爱的台阶上,我的就业梦圆满而美好。”那天,阳光很好,我们走出市房产中心大厅,站在暮春的暖阳下,身心都是暖意融融。住新房,一直以为是遥不可及的梦,今天成了美好而真实的现实……”写她遇到困难时,一位陌生的小伙子,用绳子,一端绑住她的车头,另一头绑在他的车后,用电动车拉着她,一直送到东湖大院——她单位的门口。

她是个懂得挚爱的女子。

随着她的《走读河口》,感受河口深厚的历史文化;在《百年风华青年会》里,领略青年会的前世今生;她写王审知,写“虎王”胡文虎,写福州的开埠……她写的是福州的古往今来,她写的是一个女子的挚爱。她把自己深沉的大爱化为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自豪之本,她用自己的眼耳舌鼻身爱着脚下这片土地,她也要用眼耳舌鼻身来感受,这是她的有福之州。

她更是个幸福的女子。

她写乡情,写人生的出走与回归,写福州与随州,写他乡变故乡,从此,她有了两个灵魂的栖息地。读着这些情深意切